

鹭岛新生

——厦门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

中共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中央文献出版社

厦门的接管与成功的
改造,是厦门人民的伟大
胜利。

梁灵光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二

继承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作风
先富带后富为全富而团结奋进

林一心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日



解放廈門接管廈門
建設新廈門

張維茲

一九五六年
一月廿

目 录

专题综述

接管与改造——厦门地方接管与社会改造

- 专题 黄坤胜 卢茂材 (1)
- 同安县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综述 中共同安县委党史办 (84)

回忆录

- 接管厦门 民主建政 梁灵光 (112)
- 厦门金融业的新生 张可同 (121)
- 参加厦门解放的实业接管工作经过 王维鹤 (128)
- 建国初期对厦门私营工商业的改造 王昆坤 连宪武 (140)

典型材料

- 厦门市总工会成立前后 蔡燕生整理 (149)
- 解放初期厦门工人阶级在社会改造中发挥
 重大作用 王炳信 蔡燕生 (161)
- 接管国民党的警察机构与建立人民公安机
 关的工作 姚自强 (174)
- 解散反动党团特务组织与对其成员进行登
 记工作 姚自强 (178)
- 解放初厦门市军管会对厦门大学的接管 肖学信 (182)
- 接管旧商会整理改组同业公会工作概述 陈逢源 (195)
- 记述厦门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工作 姚自强 (208)

重要文献

- 厦门市接管方针与任务（1949年9月28日）……………（233）
- 厦门接管工作报告（1950年1月）…………… 黄火星（241）
- 关于调整本市（厦门）公私工商业关系
（原载1950年8月7日《厦门日报》）……………（262）
- 厦门一年来工商业的改造情况
（原载1950年11月1日《厦门市政》）……………（266）
- 中共厦门市委关于厦门现阶段工商业情况
的分析（草案）（1951年）……………（271）
- 厦门市六个月来镇压反革命情况报告
（1951年5月24日）……………（277）
- 厦门一年来的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9月）…… 王亚朴（283）
- 厦门工商界爱国捐献运动的初步总结
——工商联筹委会主任蔡衍吉（原载1951年
9月16日《厦门市政》）……………（288）
- 厦门市人民政府两年工作报告（1951年12月5日）……（291）
- 厦门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五反”运动
的基本经验（节选）（1952年8月5日）……………（300）
- 扩大物资交流 促进城乡发展——庆祝本市秋季物资
交流大会胜利闭幕（原载1952年11月26日《厦
门日报》社论）……………（305）
- 厦门市接管与社会改造大事记……………（308）

接管与改造

——厦门地方接管与社会改造专题

黄坤胜 卢茂材

1949年10月17日，正是金秋的收获季节。五星红旗在鹭岛上空冉冉升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希望呀……”歌声多么嘹亮！鹭岛在翻腾，男女老少，笑逐颜开，奔走相告：“我们胜利了！”“我们解放了！”这一切向世人庄严宣告：厦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了长期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斗，终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互相配合、共同努力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厦门的反动统治，迎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纪元。但是，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①紧跟着这一步的，便是为着建立新政权的城市接管以及巩固新生政权，建设人民的新厦门而奠定基础的艰巨、复杂但又充满着希望的社会改造工作。

厦门解放前的社会概况

厦门，在福建省的东南部，处于东经118°04′04″和北纬24°26′46″交叉点上。历史上的厦门由厦门本岛和它西南面的鼓浪屿岛为主体组成的四面环海的孤岛。厦门全岛面积124平方公里，鼓

浪屿岛面积 1.71 平方公里，它的周围，还有大小岛屿三十余个。

厦门位于台湾海峡的西南海岸，面对金门和澎湖列岛。背靠闽南大陆的漳州、泉州两市，史称“高居堂奥，雄视漳泉”。

厦门又是位于九龙江出海处，海岸线曲折，港湾蜿蜒长达 24 公里，港口面积达 320 余平方公里。港区内水域阔、航道宽，水深多在 10 米以上，而且港区内终年不冻，四季畅通无阻，是个天然良港。

从厦门往北，沿海路可达宁波、天津、上海以至日本；往西南，距香港只有五百三十多公里，因而，经广州、香港可以通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南洋各地。由于厦门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八闽的门户、福建省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因而，清朝末年有人用“厦门”二字写了副对联：“夏庇五洲客，门收万顷涛”。

由于厦门卓越的地理交通条件，自明、清以来，厦门就一直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对外交通、贸易的重要口岸。许多华工也是从这里远渡重洋，到国外做工、经商，有的是被拐卖出洋的。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每年从这个口岸出国的华侨达几万甚至十几万人，所以，厦门又成为我国著名的侨乡和华侨出入境的一个重要港口。

鸦片战争以后，根据《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厦门被划为中国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被迫开埠之后，厦门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厦门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陷入灾难深重的生活之中。

1938 年 5 月 13 日，厦门沦陷。此后至 1945 年 8 月厦门人民饱受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摧残与蹂躏达七年有余。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厦门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渴望和平，以图重建家园。但国民党、蒋介石全然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团结的愿望，于

1946年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南下，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土崩瓦解。但是，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妄图固守台湾。厦门就成为他们扼守台湾的重要屏障，为此，蒋介石曾于1949年7月22日和10月7日，先后两次亲自到厦门督导、布置防务，并派亲信汤恩伯和被称为“杀人魔王”的毛森掌握厦门军警大权。有鉴于此，解放前夕的厦门城市形成了如下的特点：

1. 政治上：

由于厦门重要的地理位置及其优越的交通条件，自抗战胜利、厦门光复之后，国民党政府就极具注意经营厦门。因而，厦门的反革命政权机构较为完备，军事上存在海军与地方军两大军事势力。中统和军统特务组织也设有他们的分支机构，绑架、暗杀活动频频发生。解放前夕，蒋介石为强化厦门的反动统治，特派原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军统特务头子毛森接任厦门警备司令，加紧其特务活动。他大肆镇压革命活动，屠杀地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制造白色恐怖。因此，厦门市军、警、特横行。加上历史上形成的厦门社会上的黑势力，如草仔安派、城内派、厦港派等等。他们各霸一方，与官府相勾结，开烟馆、赌馆、妓院，聚众斗殴，敲诈勒索，欺压平民，横行街头巷尾，无恶不作。解放前夕，这些地方黑社会流派又纷纷加入军统特务头子毛森组织的“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以及军统头目吴贞为首组织的闽南水上保安纵队等等反共组织，形成官匪合一，政治上极为黑暗、反动。

2. 经济上：

由于厦门是个天然良港，交通便利，自17世纪以来，它就逐渐成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对外交通和贸易口岸。1683年，厦门正式设立海关。1842年，厦门被划为中国五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

后，海关自主权逐渐丧失，鸦片、洋货大量涌入，厦门成为西方列强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重要市场，逐渐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19世纪后期，一些华侨资产阶级在“实业救国”的思想影响下，开始组织资本回国投资，厦门市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才开始建立并逐步发展起来。从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厦门形成华侨投资的全盛时期，投资户数达2019户，投资总金额为53346598元（人民币，下同），平均每年投资数达6668324元。^②1938年至1945年厦门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下，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备受摧残，几近凋零。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为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不顾丧权辱国，投靠美帝国主义，以致美国商品大量倾销厦门市场，使厦门市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根本得不到休养生息的机会，造成厦门市经济畸形发展，形成市场虚假繁荣。至解放前夕，厦门市经济总的特点是：

A. 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且多数工厂处于半停顿状态。厦门近代工业建设历史较早，但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它是随航运和对外贸易而兴起的。1858年，厦门即创办了海军造船厂。20世纪初，厦门已能生产柴油机、抽水机，销至广东、浙江。抗日战争期间，厦门沦陷，厦门民族工业或是被日商吞并，或是被强占，几乎被摧残殆尽。1947年，马来西亚华侨黄重吉先生将其在南洋各工厂的机器迁至厦门，厦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方有些复兴。但是，由于内战复燃，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原材料的飞涨，黄重吉先生开办的工厂除烟厂、电池厂之外，其余各厂均因销路不畅而陆续关闭，市场上充斥的尽是欧美倾销的商品。据不完全统计，至解放前夕，全市仅有工厂94家，其中除自来水、电灯、电力、电话、轮渡等5家公用事业外，其它是织布、火柴、纸箱、电池、橡胶、烟草、罐头等小型工厂，且大多规模不大，资金不足，设备落后，工人较少，甚至有一部分是作坊式的生产。有相当一部分不能正

常生产，能开工的仅 71 家，只占工厂总数的 70%，1950 年工业总产值仅仅只有 2503 万元。

B. 商业比较发达，但属畸形发展，呈虚假繁荣。厦门交通便利，到 17 世纪中叶已成为“远近贸易之都会”。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各行各业的店铺达 5217 家。1938 年 5 月，厦门沦陷，厦门市的商业遂一落千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又因欧美洋货大量倾销市场，以致厦门商业呈畸形发展。大多数商业企业为官僚买办、上层人士及海外宾客消费性服务的行业。据解放初期的统计，解放前夕，厦门市的银楼、钱庄、参药、酒楼、面饼食品、烟酒等行业占全市工商户三分之一强。另一方面，因厦门是重要的进出口岸，与世界上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从事批发业务和进出口业务的比较多，同时造成外币充斥市场，外汇投机极为猖獗。1946 年厦门市的外贸总值占全省的 72%，但进口远远大于出口。1948 年，厦门口岸出口总值不及进口的总值的 1/15，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外贸关系的反映。由此可见，解放前的厦门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消费性商业城市。

C. 经济上与华侨资本关系极为密切。厦门市是我国东南沿海的著名侨区，华侨出入境的口岸。自 19 世纪后期，华侨就开始投资于厦门的工商业。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前的 74 年中，华侨对厦门投资金额高达 400 万银元，占近代华侨在福建投资的 62.84%，占在全国投资的 12.49%，居全国城市的第一位。^③在解放前夕全市私营工商业的 81 个行业中，华侨投资达 41 个，总计 160 户，计资金 107794 元。厦门市比较著名的电灯、电话、自来水等公用事业公司都有华侨投资，而且是以华侨资本为主的。厦门市的侨汇数量也很大，每年占全国外汇收入的 40%。1946 年至 1949 年，福建侨汇总计 13400 元，其中 90%是由厦门转解收款的。由此可见，华侨资本对厦门市的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3. 文化上：

由于厦门交通便利，与海外关系密切，而且经济比较繁荣。因此，厦门市的文化教育事业较为发达。特别突出的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倾资兴学，1919年就开始在集美创办了从幼稚园、小学、中学以及水产、师范、商业学校等，形成了颇具规模的集美学村。并在1921年创办了厦门大学，同时力主“改革弊制”实行开明、民主办学的方针。因而，这些学校吸引了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如著名教授鲁迅、王亚南、林惠祥、林砺儒、熊德基、郭大力等人，都曾先后在厦门大学任教，马寅初、黄炎培、林语堂等都曾到两校讲学。厦门市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也是于1926年2月在厦门大学建立起来的。因此，厦门市教育界民主革命的气氛比较浓。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在解放前夕曾被誉为“传播马列主义的策源地”、“革命摇篮”、“厦门市的解放区”等。厦门市的新闻事业也比较发达，除国民党控制的《中央日报》、《立人日报》外，还有一些私营的报纸。如《江声报》、华侨胡文虎先生创办的《星光日报》等等。这些民办报纸，立论比较公允，经常成为民主人士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宣传民主、要求进步的舆论宣传阵地。

综观以上可以看出，解放前夕的厦门，是一个被国民党反动统治严密控制的又存在一定民主进步力量、经济上比较繁荣的典型消费性商业城市。

解放前夕的接管准备工作

鉴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企图割据长江以南，以图东山再起。为此，1949年4月21

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险，并于当日子夜，突破国民党近千里的江防阵地。23日晚，人民解放军又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政府22年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关于“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指示，以排山倒海之势，继续向南挺进。5月27日，解放了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此时，中共中央军委又作出《对于向全国进军的部署》，指示第三野战军：“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安排熟悉福建情况的叶飞为第十兵团司令员，并以三个军的兵力担负解放福建的任务。为了接管和经营福建，中共中央还决定由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负责组建中共福建省委，做好接管福建的一切组织准备工作。6月1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由张鼎丞、叶飞、方毅、伍洪祥等12人为委员，组成中共福建省委，张鼎丞为书记。7月初，中共福建省委领导班子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南下入闽，中旬抵达福建建瓯。25日，张鼎丞在建瓯大戏院宣布中共福建省委正式成立。并提出今后的任务是：“吃饱饭，打胜仗，解放全福建”。解放福建的帷幕就此正式拉开，厦门的解放也就指日可待。

厦门地下党组织为接管厦门而努力工作

为了迎接厦门的解放，准备接管厦门、建设新厦门。厦门地下党组织和南下大军以及随军南下的“中共福建省委”和“南下服务团”等密切配合，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

厦门地下党组织有着光荣的历史和优良的革命传统。早在1926年2月，厦门市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就在厦门大学建立，它不仅是厦门最早的党支部，也是福建省最早建立的党支部之一。随后，它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迅速向闽西南地区 and 全省各地发展起来。虽然，她经历了1927年“四九”厦门反革命政变的摧残，但她依然领导着厦门人民，踏着革命先烈的血迹继续前进。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中共福建省临委暨福建省委、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的机关也设在厦门。1930年5月25日，在中共福建省委领导的精心组织下，成功地举行了轰动全国的大破狱。这一成功的行动，营救出关押在厦门思明监狱内包括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省团委书记陈柏生等在内的三十多位共产党员、苏维埃干部、红军指战员及其家属。1938年5月中旬，厦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后，因厦门本岛环境险恶，活动空间过小，不易与日寇周旋，厦门党组织才被迫撤离到漳州、泉州内陆一带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斗争。

1945年9月，伟大的抗日战争刚刚结束，隶属于中共闽浙赣区党委所属的闽中地委立即把准备迎接南下部队而组织起来的挺进工作队（队长许集美，队员郑种植、施能鹤）派到厦门，开展恢复党组织的活动。这是自1933年5月厦门沦陷，地下党撤出之后最早回到厦门的地下党组织。1946年4月，正式成立中共厦门工委，许集美任工委书记，郑种植、施能鹤为工委委员。工委由

中共闽浙赣区党委所属的中共泉州中心县委领导，这就是习惯上所称的“闽中”地下党组织。

1946年春，中共闽浙赣区党委闽江工作委员会（简称“江委”，即省委城市工作部的前身）决定由所属的学生工作委员会（简称闽江学委）负责开辟厦门地区的工作。3月，“江委”负责同志李铁派黄猷来厦门。7月至9月，“江委”又派闽江学委委员王毅林等人来厦门开展工作，建立党组织。党组织得到发展以后，于1948年5月成立了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城市工作部厦门市委，由王毅林任市委书记。这是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在厦门建立的第二个党组织。

1946年底，中共闽粤赣边区临委所属的闽南地委派陈华负责厦门（含同安）白区工作。陈华先在同安地区发展党组织，继而向厦门市发展。并首先在厦门大学发展了几个学生党员，成立支部，不久，即成立了隶属于中共闽粤边临委闽南地委领导的厦门市委，由陈华任书记。这就是常称为“闽西南”的厦门地下党组织。

在厦门的三个地下党组织，不仅分别属于闽浙赣和闽粤赣两个不同的系统，而且由于地下斗争环境险恶，形势错综复杂。因此，这三个党组织相互间不发生横向的联系。但是，在艰险的地下斗争中，他们都为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这一目标而相互支持，默契配合，共同斗争。1949年4月，厦门城工部地下党组织由于省委城工部组织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保存力量、避免暴露组织，以遭受更大的损失，厦门城工部被迫解散。这时，闽西南和闽中党组织的同志出于对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的了解，认为厦门城工部绝大多数党员都是经过考验的党的忠诚战士，都是纯洁、可靠的。因而毅然顶着压力，将他们的成员以个人的身分吸收到闽西南和闽中党组织中来，重新入党。体现了这二个党组织具有

高度的党性。这样，厦门临解放前夕，在厦门坚持地下活动的实际上只有闽中和闽西南二个组织。厦门地下党的恢复与发展，为厦门的解放和接管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国民党精心布防的长江天险之后，全国的解放已指日可待。为了迎接大军南下，迎接福建的解放，中共闽粤赣边区党委与闽浙赣省委加紧部署工作。1949年5月，中共闽南地委任命施耀为特派员，到厦门指导工作。6月，经中共闽南地委同意，成立中共厦门临时市委。同时，要求厦门临时市委为解放军顺利解放厦门、接管厦门努力创造条件。闽浙赣省委也根据形势的变化和中央华东局的指示，结合本区实际情况，作了积极的准备和部署。号召全区人民为配合解放军解放闽浙赣而积极展开斗争。并强调党员、干部应根据各地具体条件，有目的、有步骤、有中心的、坚决的克服一切困难，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与方式，为这个中心任务而工作。

总之，留在厦门白区的闽中和闽西南党组织，坚决贯彻执行上级指示，为配合大军南下、准备解放厦门、接管厦门进行各项艰苦的斗争。具体的任务是：对厦门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统战和策反工作；继续输送干部，支援各游击区；开展护校、护厂及反劫运、反破坏斗争。

首先，厦门市党组织积极开展宣传攻势。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方针政策。1949年7月、8月间，闽中党组织大量翻印、散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简称“约法八章”）和他们编写的《告厦门人民书》、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厦门市工委还指示在《江声报》工作的地下党员在报纸上发新闻、电讯并将这些宣传品由党员和群众在码头、车站、戏院等公共场所广为张贴。有一部分则利用邮局这条渠道寄给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工商界知名人士。通过广泛地宣传党的政策

活动，对分化瓦解国民党军政人员、安定工商界人士思想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其次，二个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和上级发下来的调查提纲，发动所属党员努力通过各种社会关系采取全面铺开和重点调查相结合进行的方法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时，闽西南已建立党组织和有党、团员的单位，除大中学校外，还有电信局、电话公司、市广播电台、盐务局、省立医院等单位。所在单位的党员都根据党组织的布置对本单位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调查。如厦门广播电台周珠凤同志抄录了电台的组织情况及器材清单交给党组织；盐务局的薛太吉同志掌握了盐警编制和武器装备情况；电话公司杨清桂、叶禧等话务员，也利用她们接线工作上的方便进行窃听，当她们窃听到国民党准备将厦门银行的黄金、白银运往台湾等重要情报时，及时向党组织反映，让党组织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反窃运工作。新闻记者中的党员和他们所联系的群众；利用采访的方便，对厦门党、政、军和重要工厂企业、文化教育机关、各界知名人士等作了详细的调查。闽中党组织将他们的调查材料整理成册后，即转送到解放军十兵团和设在泉州的厦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他们对这些调查材料极为赞赏，认为这些调查材料，为以后军管会制订详细的接管方案，接管厦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厦门闽中党组织还争取了市政府秘书长郑静安，使市政府的档案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为以后接管厦门的实施带来了不少的方便。

第三，转移干部，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厦门是福建东南沿海的重要城市，又是重要的交通口岸。蒋介石统治集团败退台湾前后，都把厦门作为其固守台湾的重要屏障。因而，厦门解放前夕，岛内军警林立，白色恐怖严重。厦门地下党组织自1945年开始恢复之后，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党员人数不断增加，而且周围

团结了不少进步学生、群众和民主人士。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对国民党反动派组织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因而也逐步暴露了一些党员、进步群众的政治色彩。另一方面由于周边地区武装游击斗争的需要。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支援游击区斗争，决定将一些色彩较红的党员、进步人士转移到游击区。因此，自1947年上半年开始，厦门地下党组织就有计划地将这些党员、革命青年学生和民主人士输送到闽南、闽中游击区去。1949年临近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狗急跳墙，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镇压。转移输送工作达到高潮。据统计，在两年多期间，厦门闽中工委分批输送了200多位同志到闽中游击队泉州团队。其中有厦门大学、侨师、市区各中学的教师和学生，也有在《星光日报》、《江声报》工作的编辑、记者，还有在省立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江声报》副社长许祖义、《星光日报》主笔郭荫棠、原《星光日报》电讯室主任地下党员胡冠中等人，也都是在闽中党组织的安排、护送之下先后进入游击区的。他们在游击区内充分发挥了各自的才能，为游击队配合南下大军解放、接管厦门作出积极的贡献。

厦门闽西南地下党组织，在1947年11月，因中共闽南地委领导人之一的罗琳被捕后叛变，导致中共厦门闽西南党组织领导人陈华也被捕。党组织就将厦门大学支部5名支委撤离厦门到香港。避免了厦门大学党支部败露的危险。后来这批党员到香港后经中共华南分局批准，成立了中共泉厦临时工作委员会后回闽工作。1949年春节前后，中共厦门临工委（闽南）从厦门大学、侨民师范学校、集美学校等大中学校组织了大批党员到安南永游击区工作。据粗略统计，中共厦门临工委从1949年初到厦门解放，输送了200余名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支援了游击区。

为了搞好党的统战工作、保护进步力量，临近解放前夕，厦门党组织还将厦大一批进步教授，如王亚南、熊德基等人撤往香